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雷娜.交流与融通: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百年译介考察[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6):7-12.

交流与融通: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百年译介考察

雷娜

(河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30)

摘要:中国民间文学在 20 世纪对包括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类型学理论、心理分析学派理论在内的诸多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进行了译介,不仅引进了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概念、理论方法,而且促使中国学人主动运用这些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产生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反思百年译介过程可以发现,中国民间文学领域注重外来理论的译介,但缺少中国本土理论的对外译介,究其原因,在于缺少本土化理论构建意识,缺少对外传播与翻译意识。反思百年译介的成就和不足,能为 21 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and 方向。

关键词:民间文学;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翻译史

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2)06-0007-06

中国民间文学发端于史前的原始神话,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每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和文学样式。根据学术史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间文学^{[1](P1)},而这个节点就是五四运动。相应的,对民间文学进行理论研究的民间文艺学^{[2](P211)},我们也可以对其作同样的划分,即,1918 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正式开始。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新文化运动,西方文化思潮和学术方法逐渐被引入和翻译到中国,使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呈现出了新的气象,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从而对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和民间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民间文学理论的引进和译介。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民间文学理论开始占据上风,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中,“类型学、文化人类学、流传学派、形态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演理论、文化诗学等外来理

论不断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和本土材料相结合,形成民间故事采录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元的特征,初步搭建了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3]。每一流派被引进之后,都会对当时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产生广泛的影响,或运用这些理论原理分析中国民间文学事象,或促使学人反思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现状。外国民间文学理论逐步引介到中国,形成了如今多元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本文拟从翻译史的角度,梳理外国民间文学理论不同流派在中国的百年译介过程,探讨翻译与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契机,以期对中国民间文学和翻译学的发展有所启发。

一、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译介:以文学家为中心

神话学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支系,是世界范围内广泛研究的领域。人类学派神话学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国外有重要的影响力,随后,“人类学

收稿日期:2022-07-30

作者简介:雷娜(1983-),女,河南浚池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民间文学理论及翻译研究。

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4]。周作人、赵景深、杨成志、郑振铎、苏秉琦等人最早翻译了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相关研究作品,另有孙毓修、谢六逸等编译了该学派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为中国早期的神话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0 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梁启超等人较早开始运用该思想研究中国的神怪等叙事艺术,第一次提出“神话”一词。周作人早期虽然运用该学派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神话,但其译介始于 1907 年,他以笔名周遑翻译了哈葛德(H.Rider Haggard)和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世界的欲望》(*The World's Desire*),又名《红星佚史》。原作者在该书序言部分阐明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认为从神话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事实,“始知希腊亚佉亚人与刺美锡支朝之埃及,信久有交涉。此其说虽多见诸希腊传言,及今证以埃及密舍那(Mycenae)古堇中残物。英勒凡丁(Levantine)时遗翁,乃益知非妄。即在鄂谟诗史。亦载阿迭修斯述亚佉亚侵袭埃及之事。虽云其言难信。顾初亦不尽出于诬。”^{[5](P1)}这是第一次以书面形式译介英国人类学派思想的文章,从神话中寻找历史遗迹的人类学思想,由此在中国民间文学的神话学中开始运用。在该书译者序中,周作人也认为,“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他如书中所记埃及人之习俗礼仪。古希腊人之战争服饰。亦咸本古乘。其以色列男巫。盖即摩西亚伦。见于旧约。所呼神名。亦当时彼国人所崇信者。具见神话中。著者之一人闾俱氏。即以神话之学。名英国近世者也。”^{[5](P4)}

随后赵景深翻译了英国哈德兰德(Hartland)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一文,这是我国首部较为系统和完整地翻译人类学派神话学学术思想的译作。作者结合希腊神话和英国的 Cinderella(灰姑娘)、印度神话等,来说明神话和民间故事都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口头叙事,反映了人类基本的生理、心理、伦理等内容,因此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和文化的差异性。“希腊故事和别的欧洲民间故事一样,是从比较古且亦较野蛮的时代以口传下来。‘培根说:他们是普通东西,从以前的记忆留下来的。’所以他们不过是一些思想和制度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上可以看出希腊人升到文化最高点的情形。”^[6]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例证了人类学方法在神话和民间故事研究中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性,特别指出人类学神话学派与神话研

究的语言学派论争的过程、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核心,从而指出该方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同时,对该流派代表人物泰勒(Dr.Tylor)、安德鲁·朗、门哈特(Mannhart)等人进行了一定的说明。

“人类学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人类学方法便是将许多同类的民间故事归纳起来。基本工作便是要多多地搜集材料;因为相关的事搜集得愈多,归纳的结果一定也愈准确。多量的故事聚集成书,这样是近半世纪的事;以靠得住的归纳方法使学者明白许多世界各处风俗和信仰的充分知识。这些故事、风俗和信仰的知识就连古代的哲学家也赶不上。”^[6]

之后,赵景深还翻译了麦苟劳克(Macculloch)的《民间故事的探讨》^[7]《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林汉达节译了葛理格司(Griggs)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伦理价值》^[8]等,其中《民间故事的探讨》一文,不仅系统介绍了英国神话学研究的大致发展过程,而且明确指出神话学研究已经具有了学派的特征。^[7]一时间,众多相关研究作品被译成中文,从此神话学派的理论思想从零星译介到作为一个流派系统被中国众多文学翻译家们引介,在国内民间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9]《金枝上的叶子》^[10],赵景深《童话学 ABC》^[11]等众多中国学人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成果问世,形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理论中的文学人类学派。这一学派在中国民间文学发展中一直占据主要的地位,并随着《金枝》《原始文化》等人类学巨著在 20 世纪中叶被民俗翻译家译介到中国,其影响不断加深。“在所有西方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中,中国学者对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使用最为娴熟,也最为广泛和久远。中国现代故事学的蓬勃兴起,与遭遇了这种研究方法有着直接的关联。”^[12]

可以说,通过翻译,译者不仅译介了西方流行的人类学派思想,为 20 世纪的中国仁人志士带来了救亡图存的思想曙光,而且开启了中国民间故事领域引进西方理论的先河。与此同时,也促使翻译思想不断沉淀,尤其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在翻译的过程中对神话、童话等民间文学的翻译活动、方法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和梳理,形成了具有个人风格的翻译思想。

二、类型学理论的译介:以民俗学家为主导

随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类型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紧随人类学传入我国。随着早期人

类学派神话学理论思想和方法的译介和引进,周作人、赵景深等人将该方法运用到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在此过程中,他们受到启发,发现尽管中国民间文学纷繁复杂,但表现出强烈的类型特征,如果按照类型去研究这些文学文本和现象,会更有效,他们用“式”“类”“系”等概念将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初步的分类。但因为这些分类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以钟敬文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理论家开始自觉地译介翻译类型学的相关理论和著作,以期为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武器。

《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是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界对外国类型学理论的首次译介。1928年,杨成志和钟敬文联合翻译了约瑟·雅各布斯(Mr. Joseph Jacobs)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13](P2)},该译文从英文翻译过来,借鉴了日本民俗学家冈正雄的日文译本。在这本小册子中,作者按照故事情节,将印欧的民间故事分成“邱匹得与赛支式”“白太式”“侏儒式”“辛得勒拉式”等70种类型,对每种类型故事的主要情节进行了简单的编排,算是一个简单的类型划分,虽并不完全合理和科学,但至少试图从情节把握故事的结构规律,给当时试图从情节结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学者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该书译文仅仅60多页,但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民间文学类型学研究的理论鼻祖。随后,包括钟敬文在内的众多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理论家不断翻译和运用该理论研究范式,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类型特征,产生了《中国民谭型式》《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

伴随着类型学在国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国内对该理论其他流派的译介及其代表作品的翻译也随之深入,比如在类型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派。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特定故事的大量异文进行情节单元的划分,按照情节单元的相同或者相异,归纳和构拟不同亚型和原型。该研究方法1929年由美国学者詹姆森(Raymond D. Jameson)用英文介绍到中国。1932年,江绍原编译了瑞爱德等著《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14]一书,书中《关于 Folklore, Volkskunde, 和“民学”的讨论》一文里,提到了历史地理学派,并提到了美国学者詹姆森对该学派的介绍。该学派的兴盛始于八九十年代其代表性著作被逐渐翻译到中国之后,主要代表作有郑建成等翻译的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5],陈建宪和彭海斌翻译的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16],郑海翻译的斯蒂·汤

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17],陈建宪、黄永林、李杨、余惠先合译的丁乃通《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18]等。这些作品要么对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说明,要么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研究方法对中西不同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和分析。该学派的研究观点和方法被民间文学领域广大学人运用,逐渐成为80年代引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理论。

纵观西方民间故事类型学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可以发现译者身份、翻译行为的变化,如果说民间文学理论早期的翻译活动有周作人、赵景深、鲁迅、茅盾等文学家参与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理论译介开始由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者执笔,钟敬文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奠基人,引领了西方类型学在中国的译介,随后的译者也都是这个学科内的专业学者。除此之外,译者的翻译行为从自发转变为学术自觉,他们认识到,民间文学和民俗领域内资源丰富,但缺少强有力的研究工具,因此当遇到类型学这一理论武器时,学者们热切为之。正是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得故事类型学理论广泛应用于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领域,并不断中国化,成为该学科领域内重要的理论研究方法之一。

三、心理分析学派理论的译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继续译介和引进西方新的研究理论,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为核心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民间文学心理分析学派。该学派尝试对神话和民间故事进行分析,试图从中找到民间故事情节相似的内在原因,从而揭示人类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

对弗洛伊德民间故事心理分析方法的译介最早见于1936年高觉敷翻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80年代之后,心理学视角下的民间文学引起了关注。1986年出版的孙恺祥翻译的《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一书,其中《来源于童话的梦的素材》一文,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了童话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对荣格心理学的译介也随后开始,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冯川、苏克翻译的荣格《心理学与文学》^[19]以及冯川翻译的《荣格心理学入门》^[20]。在这些作品中,荣格分析了神话、童话中的原型,不仅从民间文学中寻找论证自己理论的素材,也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陈建宪和彭海斌1990年翻译的《世界民俗学》中,有几篇译文专门介绍和研究民间故事与民俗学中的心理分析学派。^[16]

在这几篇文章中,作者运用弗洛伊德对人格阶段的划分,研究民间文学文本中的儿童行为和心理。尽管文本分析中表现出了泛弗洛伊德主义的倾向,但这些研究都试图超越文本表层意义,解读童话等隐喻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心理根源。民间文学心理分析学派的译介为研究中国民俗和民间文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方法。随后,作者列出了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诸多研究成果,包括“弗洛伊德的著作和奥本海姆(D.E. Oppenheim)的《民俗中的梦》(纽约,1958 年),奥托·兰克(Otto Rank)《神话研究中心心理分析法的贡献》,格札·罗亨(Géha Róheim)《梦的入口》(纽约,1952 年),保罗·第·卡瓦霍·勒托(Paulo de Carvalho Neto)《民俗的精神分析》(布谊诺斯艾利斯,1956 年)”^{[16](P129)}。这些研究成果尽管没有被详尽列出,但这些书目也为中国早期的民间文学心理分析学派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

民间文学的心理分析学派除了这些零星的研究成果被译介到中国外,一些系统的研究也开始被引入。其中比较著名的译作有 1991 年舒伟、丁素萍、樊高月翻译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布鲁诺·贝特海姆,1976 年)一书。布鲁诺·贝特海姆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试图通过对民间童话和文学童话中的分析,揭示童话中隐藏的心理信息。“童话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拓宽了童话研究的领域,使人们曲径通幽,细处观大,从心理层面去领悟和鉴赏童话的丰富意义,发掘童话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21](P7)}因此,某种意义上,包括童话在内的民间文学心理学派的译介为中国民间文学界打开了新的窗口,从此,民间文学的心理分析方法成为该学科新的理论工具,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相比之前两大流派理论的译介,民间文学心理分析学派的译介成果相对较少,系统的译介更少,译介的内容也集中于 20 世纪早中期的民间文学心理分析成果,缺少最新的研究成果。译者的身份也相对多元,主要是具有民间文学背景的外语学者以及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民间文学专家,前者占主导,延续了民间文学理论自觉译介的趋势。但一方面心理学派译介成果少,另一方面,那一时期译介的心理分析学派研究方法相对程式化,所以中国民间文学学人对这一流派理论方法的运用相对困难,成果较少。尽管如此,心理分析学派的译介为 20 世纪末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

四、其他流派理论的译介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对西方的研究范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加上新生代学人对外语的掌握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新的流派理论相继引入。西方理论的译介和引进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与先前的人类学派、类型学派、心理分析学派形成了共同繁荣的局面,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一时期译介的理论有“现象学”,美国表演学派的“表演理论”,美国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等。

从现象学角度研究童话的代表人物是麦克斯·吕蒂,1995 年张田英翻译了他的《童话的魅力》^[22]一书,他认为从童话中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童话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世界的真相。随后,户晓辉翻译了他的《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23]一书,着重从现象学角度研究童话的形式和本质,探讨童话发展的规律。西方神话现象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恩斯特·卡西尔,黄龙保、周振选翻译了他的《神话思维》^[24],于晓翻译了他的《语言与神话》^[25]等。他试图从神话、语言理解艺术思维的功能:“通过把神话还原到自身,使一个作为本源经验形式的纯粹神话现象的世界展现出来,由此为神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26]

美国的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作为 20 世纪后期比较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虽然二者的理论基础有所差异,但都承认互动过程中的文本研究,而且二者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前者的代表著作有朝戈金翻译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27]、尹虎彬翻译的《故事的歌手》^[28]等。这一理论方法论的引进,一时引领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发展。后者的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鲍曼、丹·本—阿莫斯等人。他们的作品也相继被译介到中国,比如,《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29]、《“表演”新释》(《民间文化论坛》2015 年第 1 期)、《〈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译本序言》(《民间文化论坛》2008 年第 6 期)、《“表演”的概念与本质》(《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民俗界定与研究中的“传统”观》(《民族艺术》2006 年第 2 期)等,都对表演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译介,在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一流派将民俗和民间文化事象的研究聚焦到特定时期、特定场景下某一人物的文本活动与当下语境的互动中。“从‘表演’是一种

交流实践的模式这一视角来看,文本性不仅仅是一段再三重复的口头文学的预先包装,而且是一次话语的实现,一个将一段口头表达展演或再生产为文本的实际过程,即‘文本化’的过程。”^[30]表演理论的译介扭转了中国民间文学的静态化研究传统,使之开始关注互动中活态的民俗事象。

民间文学的动态研究要超越“文化遗产论”,关注当下的民间文学形态,挖掘其当下形态的社会价值。此时新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逐渐受到关注并被译介到中国,这一理论流派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代表人物有杰克·齐普斯等。该流派将民间文学放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框架中,强调民间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解释了民间文学传承与变异的原因,另一方面,挖掘了民间文学传承变异的规律,探索了新时代民间文学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契机。近年杰克·齐普斯的作品被相继译介,赵霞翻译了《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31]、舒伟等翻译了《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32],张举文等翻译了杰克·齐普斯的多篇相关论文。新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但由于该流派理论译介时间短,译介作品少,暂时还没有广泛的影响。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译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随着国家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的民俗事象被纳入到民间文学研究的领域,以往的研究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元的理论工具来探讨其内涵,挖掘其价值,这就注定了 20 世纪末以及 21 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理论译介的广泛需求。然而,由于多元的学术理论势必引导学人形成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方面分散了之前针对一个主导理论而形成的相对较大的译介和研究队伍,另一方面细化了的研究方向内部能够兼顾民间文学专业和外语翻译能力的学者相对减少,因此这一时期针对每一流派代表性研究成果的翻译相对较少,但随着译者能力的增强,这一时期的译作质量有明显提高。

五、结语

纵观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翻译史的角度审视民间文学理论的译

介,基于翻译动机、译者身份、翻译策略、翻译效果、翻译思想这几个维度考察整个译介过程,能够促使我们发现百年译介历程中的成就与不足。

译介的理论流派越来越多元,从某一时期一种理论长期占主导的局面,逐渐发展到一定时期多种外国民间文学理论被引进并共同发展的态势。同时,译者的身份主要是民间文学的专业研究人员,随着民间文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他们具有强烈的学科担当,加之他们外语水平不断提高,逐渐打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将目光投向国外的最新研究,从而促进了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由于译者外语水平的提高及跨文化跨学科意识的逐渐增强,翻译的策略选择逐渐优化,译作的质量也逐渐提高。伴随着外国民间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中国民间文学领域的学人不仅对西方民间文学学派、学术思想、学术概念、理论方法有所了解,而且主动运用这些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产生了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促成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的产生和繁荣发展。

其实在与西方民间文学理论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民间文学界也在不断研究西方理论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适用性,反思中国本土民间文学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尽管在西方理论的推动下,中国民间文学的多元理论体系已经搭建起来,但还存在着一些客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少本土化理论构建意识,缺少对外传播与翻译意识。但是,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已经开始新的探索,刘守华《中华民间故事史》等一系列民间文学理论著作经由“中华外译”项目以多种语言译介到国外。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翻译实践,也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卷[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2]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漆凌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述评[J].民间文化论坛,2019(3).
[4]刘锡诚.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文学人类学派[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5](英)哈葛德,安度阑.红星侠史[M].鲁迅,周作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英)哈德兰德.神话与民间故事[J].赵景深,译.小说月报,1926(8).

[7](英)麦苟劳克.民间故事的探讨[J].赵景深,译.文学周报,1927(4).

[8](英)葛理格司.神话与民间故事的伦理价值[J].林汉达,译.世界杂志,1931(2).

[9]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J].江苏教育,1933(11).

[10]周作人.金枝上的叶子[J].青年界,1934(4).

[11]赵景深.童话学 ABC[M].上海:世界书局,1929.

[12]万建中,李琼.20 世纪民间故事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情结[J].民间文化论坛,2009(2).

[13](澳)约瑟夫·雅各布斯.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M].杨成志,钟敬文,译.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14](英)瑞爱德,等.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M].江绍原,编译.上海:中华书局,1932.

[15](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郑建成,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6](美)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C].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7](美)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18](美)丁乃通.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M].陈建宪,黄永林,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9](美)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0](美)C.S.霍尔,V.J.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21](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M].舒伟,丁素萍,樊高月,译.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1991.

[22](瑞士)麦克斯·吕蒂.童话的魅力[M].张田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3](瑞士)麦克斯·吕蒂.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M].户晓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7.

[24](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5](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26]户晓辉.卡西尔与神话的批判现象学[J].民族文学研究,2009(3).

[27](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8](美)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29](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0](美)理查德·鲍曼.表演中的文本与语境[J].杨利慧,译.民间文化论坛,2015(4).

[31](美)杰克·齐普斯.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M].赵霞,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32](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M].舒伟,主译.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Folk Literature Theories in the Past Century

Lei 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0030, Henan)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cholars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many foreign folk literature theories, including mythology theory of anthropological school, typology theory,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school, which not only introduced academic ideas, academic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of different schools, but also encouraged Chinese scholars to actively use these theoretical tools to study folk literature and folk customs in various periods of China. It has produced fruitfu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it is found that the field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tha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ative theories to the foreigners. The reason lies in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hinese theories, and the awareness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Reflecting on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ransl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will provide new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folk literature; foreign folk literature theories; history of translation